

核心阅读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正值延安马列学院建院80周年。学院的党性教育是当年学员共同的深刻记忆，除了紧张的课堂学习和课后自学，还离不开学院组织的课余活动。学员对在课余活动中增强党性的回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新时代我们党全面加强党性锻炼、筑牢党性基石具有借鉴意义。

史海拾贝

延安马列学院的课余活动

林 宁

增强党员意识

1940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声援苏联卫国战争，学院决定在学员中选取文娱骨干排演德国剧作家沃尔夫所编著的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当时剧组决定王丹一同学饰演马门教授的妻子，因为她曾成功饰演过学院排演的高尔基《母亲》一剧中的母亲主角。

而这次王丹一有沉重的思想包袱，觉得再演戏就会分散太多的学习精力，不想再演了。于是她找到张闻天院长理直气壮地说：“洛甫同志，我不想再演戏了，我是来读马列主义的呀！”张闻天和蔼地说：“为纪念十月革命，声援反法西斯战争，朋友有难，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呀，作为共产党员，这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王丹一仍执拗地说：“可是演戏太耽误学习时间了，更何况马上就要学习《资本论》了，我已经演过一次，就让别的同志演吧！”张闻天接着说道：“要学好马列，也要演好戏，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是绝不会退缩的。导演认为你合适，就要勇于承担呀！我看你会定胜的。”

张闻天在鼓励的同时两提“共产党员”，对王丹一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增强党员意识教育；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不忘入党誓词，要尽党员义务，要不怕困难，担当起党员该担当的责任。经过教育，王丹一的思想很快就通了，愉快地接受任务并出色地完成了排演。

增强密切联系群众意识

1940年冬，国民党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进村征购粮食，以保障边区党政军机关人员必需的粮食供给，学院也派出了数十名学员参加。参加征粮的学员，在农村基层工作锻炼中增强了密切联系群众意识，明白了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深入群众，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来完成艰巨任务。

有一批学员被分配到甘肃陇东征粮分团。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先从吃住上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快速融入他们的生活。要习惯吃沾上了干牛粪的面食，习惯住人驴同窑、空气不清新的陋窑，而且还要克服生活用水困难。学员邓剑泉回忆说：“这些生活习惯和条件，和我生长的南方差别很大。可是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担负着供给边区的征粮任务，必须在工作中锻炼自己，密切和群众的关系，适应这比较艰苦的生活。”

为了做好征粮动员工作，学员刘绍炯兴奋回忆起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以记户主姓名的方式开始拉近与农户距离的征粮往事：“每次开户会，我用点名的方式核对人名，逐步熟悉户主。说也奇怪，很多人坐的位置一般比较固定，只要肯下功夫，几次以后就能记住一些人的姓名。可以指名道姓地与他们对话。从此，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增强劳动伟大意识

1939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上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机关、学校全体人员也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学员们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轰轰烈烈地投入到学院组织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去。

对于学员开展生产劳动的意义，

“五一口号”与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

卢 毅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70年过去了，仍值得我们认真回顾，细心品味。

“五一口号”的提出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提出：“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为了争取这一前途，他还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逼迫国民党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次年1月，有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了五项协议。但刚到6月，蒋介石便撕毁政协决议，悍然挑起内战，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惨案，先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各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号召全党“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重申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陈嘉庚、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又致信晋冀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恰在此时，新华社社长廖承志也发来一个电报询问：“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照惯例，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和决定要向全国发布？这封电报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意识到一个契机。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号》。“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最核心的第五条是毛泽东亲自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天，“五一口号”通过新华社正式发布，新华广播电台全文播发。

次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具体事宜，对“五一口号”作进一步补充说明。“五一口号”的提出和毛泽东的这封信，充分表达了中共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预示着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允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同日，他们还发出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在此期间，各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还分别以各种方式拥护“五一口号”。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在这时候，中共中央发表了这个号召，正切

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并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民建会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23日，民建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会议，“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表明“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还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称赞：“这次口号，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预示着“太阳就要出来了！”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表宣言称：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是“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文献”，号召社会各界都一致起来响应和拥护。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正式声明响应“五一口号”。民盟负责人沈钧儒还说：“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举国唾弃，天怒民怨。而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是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啊！”1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党全体同志，团结广大的群众进行战斗，与一切民主战友携手前进，有力地帮助和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胜利。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称赞“五一”号召“诚为消灭美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当时的九三学社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获悉了“五一口号”的精神内容，也立即秘密表示了欢迎态度。

以上这些对“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标

志着大多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从同情中共转变为拥护中共，这是一个根本性、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拉开了序幕。

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

“五一口号”的提出与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这里突出强调的就是中共领导。

“五一口号”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协商。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指出：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充分表现出了一种平等协商的精神。

在此后筹建新政协的过程中，中共也以谦逊的态度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如在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参与者、主要任务、时间地点，新政协名称，新中国国名、国旗、国徽和国歌以及《共同纲领》内容等问题上，都进行了充分协商。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胜利的领导者，没有自恃政治力量上的绝对优势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与其他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平等协商、共同决策，创建了协商建国、共商国是的开国之路。周恩来当时就说：“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为了平等协商，中共还摒弃了所谓“在朝”“在野”的说法。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指出：“中国现在除去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九个党，如民革、民盟、民建、民促等等……我们都是为人民做事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都是受过人民的考验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和民主党派纷纷响应的历史，生动地印证了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如何把握“战斗堡垒”的功能定位

王博广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且将原先的“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改为“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其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战斗堡垒”，本来是一个军事术语，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比如碉堡、地堡、桥头堡，都是作战中攻防的支撑点。当然，对于堡垒的作用，容易理解为纯粹是为了“防”，实际上它也有“攻”的作用，是作战中进攻的发力点。就像坦克一样，将“矛”与“盾”统一于一体，既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也能有力地杀伤敌人。战斗中，将战斗突击小组、尖刀班也称为战斗堡垒，还将可靠的老百姓称为“堡垒户”，基础好的村庄称为“堡垒村”。由于这个术语内涵丰富，“战斗堡垒”从一个军事术语延伸到其他领域，使用范围不断扩大，

而且从战争环境延续至今。

将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定位明确为战斗堡垒，也有一个过程。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提出“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十二大党章进一步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正式明确了这一定位。十四大党章又加作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的基础”，使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表述更加完整。党的十九大党章延续了这一提法，鲜明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同时强调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战斗堡垒”在党章中出现了两次，彰显出其独特的重要地位。

战斗堡垒作用与领导作用是一致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一思想在党章关于组织建设的相关章节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党的组织体制的三个层次，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前两者其领导作用的定位是一贯十分明确的，历次党章改动得也比较

少。由于形势任务、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表述就增改得比较多。这次新党章还增设了关于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功能一节。街道、乡、镇、村、社区，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在这六种社会形态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关于领导功能的定位，有的表述得直接和鲜明，有的突出了在政治思想、教育监督方面的领导作用，有的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领导”两字，但领导的职责和功能是一目了然的。这些增改，使党的基层组织功能更趋完善，充分体现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

那么，为什么要提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而不直接表述为发挥领导作用？这是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不是包揽一切。社会基层组织的性质、形式、范围、作用的多样性，决定了身处其中的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形式也呈多样性，其职责范围的大小，行使领导权力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比如，党组织要根据不同的功能定位，支持和保证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支持行政领导工作，协助开展

业务，履行监督职能，等等。这就充分体现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差别性和多样性，也为基层党组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加强领导，提供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需要强调战斗性，没有战斗性，就谈不上发挥作用，也成不了坚强堡垒。从党章中确定的基层组织的八项基本任务，以及新增加的党支部职责方面的内容来看，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责和任务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加强自身建设，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党员，可以说是加强堡垒自身建设；二是带领群众完成任务，就是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发挥堡垒功能。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战斗堡垒不是孤立的，更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与群众和其他社会组织是休戚与共的关系，也只有充分地提高战斗力，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堡垒。由此看来，“战斗堡垒”的表述确实是恰如其分。